



※一棵无名小草的基层杂忆
 ※引杜鹃啼血猿哀鸣的往事
 ※九死一生夕阳耄耋话当年

桑榆 邓钟瑞 编著

王章庆 罗耀九 校正

PDG

右派沧桑

全文提要

鄧小平說：一九五七年以前，毛澤東的領導是正確的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浩劫，中國吃了苦頭，中國吃苦頭不只這十年，這以前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開始，我們就犯了“左”的錯誤，總的來說就是對外封閉，對內以階級鬥爭為綱……。

文聿著《中國“左禍”》引鄧小平提詞：根深蒂固的是“左”的東西。“左”的根子很深。“左”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勢力。中國要警惕右，但主要是防止“左”。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，“左”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。

(非卖品)

目 录

绪言

- 一、反右派的由来
- 二、大跃进与前奏曲
- 三、大闹钢铁超英美
- 四、阴谋阳谋反右花絮
- 五、划成右派关键在领导
- 六、言行上纲上线成右派
- 七、我成右派的因素与结论
- 八、文化大革命与反右派
- 九、幸运和悲恸
- 十、错划改正

后语

参 考 资 料

- 叶永烈著：沈重的一九五七
- 叶永烈著：反右派始末
- 叶永烈著：解密名人秘闻秘事
- 隆仁等编著：新编上下五千年
- 江南都市报：朱德元帅最后的军礼
- 王兆军编著：谁杀了林彪
- 季羡林著：牛棚生活
- 文聿著：中国左祸
- 章怡和著：往事并不如烟
- 章凡玉著：记忆往事未付红尘
- (美)程念著：上海生死劫

右派滄桑

緒言

讀《中國青年報》二〇〇〇年九月七日載陳萌的文章《右派依然讓我們痛心》！觸痛了我的心，其敢于直言不諱，也壯了我的膽；只是我現在才寫《我成右派是怎樣來的》。是基層的實際情況，高端的有人寫了。這是一棵無名小草的基層雜憶，引杜鵑啼血猿哀鳴的往事，九死一生夕陽耄耋話當年。往事不堪回首而常回首，是揭諦揭諦，右派自我揭諦，般若波羅蜜多揭諦，反右真諦。在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中，究竟有多少人被打成右派？當時連黨中央都不太清楚，毛澤東的估計，全國右派份子不過4000人左右，是初于北京說的。1958年4月毛澤東在漢口會議上說全國右派30萬人，不久又說40多萬人。第二年9月《中共中央關於摘掉確改悔的右派份子的帽子的指示》中說右派有45萬人。1980年公佈錯劃改正時的統計數全國為552,877人，比實劃數必然少一點，因有些人亡家破了，未來改正。1980年5月計被摘帽者為54萬多人，剩下一萬多人繼續甄別，最後的結論是96人確定不予平反，其他所有的摘去帽子，在1957，1958年右派份子，絕大部份被送往勞動教養，監督勞動，有些人流離失所，妻離子散，家破人亡。

江西省公安廳主辦的彭澤芙蓉農場，收集贛、皖、

鄂的部份“牛鬼蛇神”，絕大多數是右派份子，人數在上萬計，圍墾尤進湖。南潯鐵路火車當時每車次抵九江，下車擔着衣被行李為押解往“勞教”、“勞改”的青壯年“牛鬼蛇神”，列隊數少時在幾十，多時至百以上計。

瑞昌賽湖農場原是抗日戰爭勝利後，國民黨裁軍時圍墾的雛型屯田農場，負責農業技術者蔡道總是國立中正大學首屆農學士，解放後入江西省農林廳工作。後也由廳調進贊縣農技站，被劃上右派份子兼歷史反革命份子，被判刑五年以上，刑滿于德安縣林泉鄉初級中學任英語教師。一九五二年省公安廳派二位處長來，哲任書記孫任場長。因當時我是省農林廳派駐瑞昌縣農業技術推廣工作隊隊長，哲、孫邀我去勘察規劃以完善建成勞改農場，收納牛鬼蛇神。然而幾乎是我自己規劃之後，成自己葬身之地，蓋我被劃右派份子後，是送往彭澤芙蓉農場勞動教養，却不收容而退返，這是罕見鮮聞的，蓋不夠屬此類條件。

與我共單位同時被劃的右派份子劉如玉，判刑五年，于賽湖農場勞改，得血吸蟲病，是死于此。

對右派份子中所謂“罪輕一點的”，各縣均自辦墾殖場，右派份子和下放幹部一起勞動，實際是對右派份子監督共勞動。當時全民皆兵制，編縣為團，鄉為營，垦殖場為鄉一級，即營，但這混雜的集中營隊，不能叫“集中營”，其名曰“幹部上山下鄉”。

湖口、彭澤、都昌三縣毗鄰的武山，由九江地區開

發爲國營武山墾殖場，供幹部上山下鄉。九江縣開發國營岷山墾殖場計有右派份子百多人，“老右”背後講過幹部、領導等人的是非，乃致談論了時政，我也看過晚上即開會鬥爭，受吊、挨打、罰跪之公審。

九江縣當時共劃了右派份子二百六十三人，錯劃改正時的統計數爲二百三十二人，其中包括中右（中間右派）八十人，右派言行十人。如此經錯劃改正的只是 88.2%，而未參入錯劃改正的爲 11.8%，以此推算，錯劃改正數 552,877 人，則實划了 626,844 人，王明稱“划右派”八十万，是毛澤東也承認批評他錯誤的八十八萬人，在反右派運動中遭到迫害（引王明著《中共 50 年》203 頁）。香港《爭鳴》二〇〇六年一月號《反右運動檔案解密》，在全國知識界中一口气划了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個右派份子。

全國右派份子加中右份子再加“反社會主義份子”及如果總計這些份子和受株連的家屬們統計在內，則數達幾百萬人之多。毛澤東的估計“右派份子”數，北京只有四百人許，全國右派份子也不過四千人左右，僅折合實際的千分之七左右。但是只北京大學一校被劃的師生右派份子即達五百多人，八個民主黨派內被劃的右派份子九千多人，其中民盟便達四千多人，幾乎佔了民主黨派中的一半，幸而這對言行的可以無限上綱上線之歷史悲歌已一去，願其一去不復返了。

各位受右派頭銜的溯源不一，有因上“萬言書”而

被加冕的，全國馳名者就是李天德。

李天德，當時年僅十九歲，重慶大學冶金系二年級學生，從保命哲學來說，可謂不懂政治、不識時務、不自量力、上萬言書《獻國策》被打成右派份子。四川雅安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于文化大革命時給他定性為“現行反革命份子”，建議：“判處死刑，立即執行”，後來四川石棉縣人民法院判處六年有期徒刑。

也有本屬善意，從幫助黨整風改進工作出發，改善領導、幹部、群衆關係，而提意見後結果說多了或言辭尖銳了，領導不滿意，認為反對他，便是反對黨的領導，就是反黨。而定性右派份子的實權，在單位領導的手上，因此很容易被“右派份子”緊箍咒鐵帽子戴上了。

江西九江縣人民政府財政科科長吳式行，高中畢業生，履行其財經政策，覺得縣、區級領導報自用公雜費趨奢，在縣整風牆報上寫了一篇《春風未過潯陽關》的文章，批評縣方整改不力，自身是共產黨員，履行黨員對整風之職責，但是家庭出身為地主，被劃上“右派份子”，取消當時行政十八級的工資每月 78.5 元，僅得生活費每月 20 元，上山勞動了四年餘，不是判刑勞改的勞動改造。

不少右派份子的年輕子女，因受累失學失業，苦受株連而埋怨其長輩，不應該亂鳴亂放，這是冤哉枉也。而起初誰也不知道這大鳴大放，是一個有計劃，有目的，有步驟的政治運動，這謀略是手段，屬陰謀抑陽謀？領

導要你上當入圈套，你是很難逃脫的。這些身不在局中人的幼稚無知子女，何能理解這種政治趨勢。

其實，這次反右派運動，毛澤東是蓄謀久遠，胸有成竹，近經粉碎高、饒反黨集團，打倒胡風反革命集團等之後。一九五七年，毛兩次全國出巡，頭次是煽風點火，後次是要突擊打仗；他對工人、農民點火，他發動工、農對知識分子進行戰鬥，說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，他們稱老子天下第一，不算天下第一到也是第二，試問工人、農民，那麼你們算什麼？以激發工農對知識分子的仇視，右派份子多是在知識分子中，毛即發動工人、農民向右派份子進攻，推行貧下中農管理學校以掌文權，講的是他們過去受苦受剥削，念文念到不認識的字，只得問學生：“啊！這是一個什麼字呀！”

毛澤東的傳達報告中，還談過讀書比“殺豬”還容易，殺豬時，“捉它它會逃，殺它它會叫；”讀書可以隨意翻左便左，翻右便右，不聽話可以把他一摔、一拋，甚至一踢。

江青早就隨相呼應，把知識分子定為牛鬼蛇神中的老九，還加上一個“臭”字，即“臭老九”。這排序是地（主）、富（農）、反（革命份子）、壞（蛋份子）、右（派份子）、資（產階級份子）、叛（徒份子）、特（務份子）、知（識份子），其實她是沿襲得元朝關漢卿戲劇中的社會階層的排序為：一、官（大官）、二、吏（小吏）、三、僧（和尚）、四、道（道士）、五、醫（醫生）。

六、民（百姓）、七、獵（獵人）、八、娼（妓女）、九、儒（知識分子）、十、丐（乞丐）。由于元朝是蒙古族統治中國，知識分子是最反對異族入侵的，所以蒙古人把知識分子列序僅高于討飯的乞丐，尚遜于賣淫的婊子；而和尚講究成佛，道士修煉成仙，不問政治，不反對他們，醫生是其治病以求活命，所以列于高層次。

誠然“老九”之不如“老八”者，妓女色遜，媚態不能承歡嫖客玩弄了，只不過“門前冷落車馬稀”，尚可“老大嫁作商人婦”；文人被“誘奸”（梁公定名）過期失寵，却被拳打腳踢，甚至嗚呼哀哉！

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時，名娼賽金花媚住聯軍統帥瓦德西，苦口婆心勸說，竟從德國兵手中，救出了一萬多中國人同胞，儒豈若娼？

以上話說儒不如娼，然而娼也未必長盛不衰，市井傳聞：有在一張特大床上，共被同睡數裸體妙齡女郎供玩，其不如意者，也會被大個子男士，大腳踢出被褥，滾下床跌昏了的，尚是哭笑不得。權威縱欲，受禍者又不止“行”也。

一、反右派的由來

反右派運動這名詞，我最早在《聯共布黨史》中，便見過斯大林曾進行過反右派鬥爭，姑且不管其起因；然而我國的起因，實是一九五六年的國際風雲驟變。

首先毛澤東的報告說：“赫魯曉夫捉到斯大林打了

一棍子”。一九五四年四月的一个深夜，即赫魯曉夫于蘇共“二十大”會後，繼續秘密揭露了斯大林的心胸只有说狭窄，疑心重、殘忍和濫用職權；蘇共十七大會選的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一百三十九名，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年被捕和處決了九十八名，佔70.5%；軍隊內的大清洗，五位元帥處決了三位，五名集團軍司令中也毙了三個，全部二級集團軍司令 10 個人全部槍毙。八十五個軍長中毙了五十七個，195 名師長中毙了 110 個。全部軍區司令員被清洗，海、空軍首腦被槍決，所有艦隊司令員僅一人得以生返等。列寧建立的第一屆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計十五名，斯大林~~失~~清洗前四人已逝世，九人則死于其手，剩下的二人，便是列寧和他自己，自然要保平安。總之直接受斯大林迫害的蘇共黨員達七十萬之衆，這是社會主義歷史上的反右部份数据。

隨之，波蘭統一工人黨書記貝魯特死于莫斯科，什麼病？不得而知，但他是忠于斯大林的。波茲蘭城發生騷亂，三天後，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街頭，學生游行，推倒了斯大林巨像，并拖着在街上走等等。

一九五六年六月和十月，波、匈先後發生罷工、游行示威和騷亂暴動。這年秋冬，中國國內也出現一些不安定的情況，有一些地方發生罷工、請願的事；不少農村夏收後，鬧糧食、鬧退社的風潮，有所發生。知識界在“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”方針的提出後，于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科學、教育等問題上，以為可以暢所欲言，

各抒己見，提出意見不少，有的意見提得尖銳了，李維漢說“姑嫂吵架”。毛說：“不對，非姑嫂，乃敵我。”便是反黨反社會的右派份子了。

一九五七年初，周恩來到北京大學，鄧小平到清華大學，發表了關於形勢的長篇講演，目的穩定和統一大學生的思想，青年學生認為矛盾壓抑；先後有北京醫學院一同學從40米高烟囱跳下身亡，5月1日清華大學水利系一同學跳西山驚峰，5月3日土木系一女同學臥軌自殺等事。

毛澤東當然受到震撼，斯大林去世後，中共中央先後發出了五個整風學習文件。考慮如何應付這民主風潮，他可能分析了中國形式，認為中國經過了剿匪、反霸、鎮反、肅反，人民尚似馴服，中國不可能像東歐吧！但也要似民主姿態，於是提出了“小民主”、“和風細雨”、“毛毛雨”式的整風，這倒是頗具吸引力，以防患于未然，誰不點頭叫好。“大民主”怕難掌握，擴大了時，則疲于對待。小民主則對方惟有是聽，只接受認錯，毫無反抗餘地，毛澤東積累了有蘇區、長征、延安等歷次整風的成熟經驗，定下了具體步驟。

首先要你大鳴大放，幫助黨整風，要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，有些人也就從容發言了。而具有成熟政治經驗的人，仍然顧慮“早春天氣”，回暖會乍寒，發言仍有顧慮。

于是便由統戰部把民主黨派人士請上天安門，毛澤

東親自打招呼，說：“今天請各位，是要各位幫助黨整風。”言辭懇切，整風邀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座談會，1956年5月8日至6月5日共13次，不信也會信，就信以為真了。

其時，上海《解放日報》有社論《我們贊成“放”》，繼之《只能“放”不能“收”》，未數日、江蘇《新華日報》社論《大膽“放”好得很》，這實際是“誘敵深入”、“引蛇出洞”，讓牛鬼蛇神“大放吧！”，讓毒草“大長吧！”實則“騙入圈套”。農村諺語，這是推老人下坑。實際是孫子兵法三十六計中的第十六計，“欲擒故縱”的效版。

且中共《中央關於繼續黨外人士對黨政所犯錯誤缺點，展開批評的指示》大約只是十天後，便另一重要指示“事情正在起變化”的論斷就出籠，毛澤東即已作出“風向轉了”，實是“轉風向了”。

已是反右的定名、對象、數字等、均已內定了。

定名：由“右傾份子”、“右派份子”、“右翼份子”三名詞中，選定為“右派份子”，“名正”則“言順”了。

對象：柯慶施認為右派份子主要是這三類人中，一類是原來民主革命時期，民主黨中的右翼，一類是過去的當權派，國民黨時期的臺上人物，一類是政治上一向懷不滿的人，這樣後一類懷不滿的概論是廣泛的，可是可非的，其家庭出身或社會關係不良，只要偶有、甚至沒有亦度其隱有不滿的情緒，甚至牽強附會，套上定性，

所謂無限上綱上線，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，便是“右派份子”了。

毛澤東更已明確具體規劃了，無論民主黨派、大學教授、大學生、專科生、中專生、高中生、行政、技術人員中，他們歷史複雜，或是叛徒，或是在過去三反，肅反被整的人，或是地主、富農、資本家子弟，或是有家屬、親戚被鎮壓的，毛澤東說：“這些人是這次運動時鬧得最起勁”，我認為可能有其人，但非盡是這些人，這些人都參加了鬧？意在按比例數據內，從這些人中去剔除，此僅是初步要劃出的“右派份子”。

數字：一九五六年三月六日，毛澤東在宣傳工作會上，指“知識分子 95% 是好的，擁護社會主義的”。換言之，即 5% 是壞的，不擁護社會主義的，預示右派份子的比例便是 5%，毋容贅言了。實際被劃的 10% 以上。

由於有指標下達，不划不行，以致有選舉產生的右派份子。這是黑龍江省哈爾濱某小單位，幹部八人，均未鳴放而盡職盡責地工作，無一個是右派份子。然而其上屬單位硬要其一個右派份子，於是沒奈何，八人投票選舉。選舉出沈德章，惟其家庭成份是富農而當選了，監督改造幾年後逝世。（戴《反右派始末》）

必須清洗打倒，先造輿論。

右派歌詞曰：“右派、右派！像個妖怪，當面他說好，背後來破壞。”

反右派運動實際便是肅反，是新肅反。這是毛澤東

反復強調的。

原來鎮反歌詞曰：“鎮壓反革命，大家一條心，它是‘人民’眼中釘，不許‘特務’害人民，‘特務、惡霸’是豺狼，你不殺它它咬人，大家快起來，全部動員，干干净淨，徹底肅清那反革命。”

肅反運動開始時，一次只準耳聞，不準筆錄的肅反傳達報告，毛澤東說：“敵人說我們殺了三千萬，三千萬是没有的，百把萬則有之”，鎮反殺人數字，其實還是有公開記錄的，你可以看一下×××主編的《××公安史輯要（1949—1990）××省公安廳 1993 年第 17 ——31 頁，盡管該書關於鎮反三期殺人數字，記述不大一致，一個 25588，一個 25385，但總數字都比 22000 還要多出 3000 人以上。致于殺、關、管，當年就超過 10 萬人，不包括捕後又放的人。（引自北京社會經濟學研究所網站，2005.01.19 楊奎松題關於建國初歷史研究選題問題的回信。）黨公布的到 1952 年底，消滅的“反革命分子”是 240 餘萬人，實際鎮壓的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保甲長的公務人員及地主，最少 500 萬人。“這些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。”民間書籍也隨土改抄沒散失焚毀，民間傳言：“勸君莫罵秦始皇，焚書坑儒理應當。”祖龍想自其始皇帝至萬世，而傳至二世即亡，後有詩曰：“竹帛烟銷帝業虛，關河空鎖祖龍居；坑灰未冷山東亂，劉、項原來不讀書。”

這次整風反右運動，是把一些被認為殘渣餘孽，

次品之次再掃除，是否干干净净？于是後來文革又提出吐故納新口號，即若呼吸作用，血液經過體循環進入肺循環把二氧化碳吐掉，吸入新鮮的氧氣，生命不止，呼吸不停，此乃至要，為整風中反右派之目的要求這看來是近因，但是政治鬥爭千絲萬縷，原因尚多，難以盡詳。

以上乃全國性的概況，致于各自成右派的具體情形，是同阱异源，分類各有稍差耳！

二、大跃进与前奏曲

為了快速實現社會主義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，推行總路線、大躍進、人民公社，鼓足幹勁、力爭上游，多、快、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。却值中蘇關係惡化，支援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蘇聯專家撤走，逼債包括歷次支援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軍火武器等款項，還要加利息，多折成糧食從西伯利亞鐵路多日夜川流不息地運付，十幾年的一邊倒，如今反臉不認情，難向中國人民交代，把右派份子先反掉，誰也不敢亂說亂動了。

國家要發生饑荒災難，上層黨政領導早已心中有數。一九五六年瑞昌縣范家埠，區行政幹部探試佈置向吃商品糧戶要獻出有多餘糧食指標，我那時是該縣農技站長，適旁座相與見了。

民以食為天，無糧則亂，後來不是野有餓殍麼？為了安定民心，來一個農業生產放衛星，後稱共产浮誇風！狂吹農業生產技術大進步，出現千斤畝，萬斤畝。我初

見《江西日報》報導鄱陽縣的水稻衛星爲畝產一千六百多斤，是江西省農業科學院書記兼院長劉志超率工作組去驗收的，以爲劉乃農業工作者（南下行政幹部），當可信吧，但還半信半疑，直增產到亩產萬斤更多時，暗中計算，以盛稻谷籮底面積，置稻田一畝折合多少籮，再按稻谷一籮淨重，如此淨稻谷平鋪堆于地，應有多少高度等機械折算，不可有幾千幾萬斤，衛星喜訊難以置信，却不敢言。躍進虛誇，勢頭很大，距右派集中營地僅十五里的黃老門墟牆上却寫上：“躍一躍，快馬加鞭三萬六，”試想畝產稻谷三萬六千斤，不是有的吃，吃不了麼？

明明缺糧，來一個畫餅充饑，望梅止渴。那兒的衛星放得越高，那處餓死的人越多，憶報載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，縣發射的“中稻高產”衛星，畝產高達十三萬多斤，衛星升天却人命歸天。結果餓死的人最多，一副省長被撤職了。而環江衛星是柳州地委第一書記賀亦然炮制的。

雲南金平縣衛星人民公社，中稻有號稱畝產 60479 斤，河南西平縣和平農業社報導小麥畝產 7320 斤，青海柴達木盆地賽樸克農場第一生產隊發射小麥高產衛星爲畝產 8585 斤。

經昔信陽事件揭秘（松原日報 2004.11.6—17 日）載《1960 年 10 月 21 日中央組織部，中央監察委員會 4 名幹部將“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的調查報告”》送達李富春，李上報毛澤東，

毛 26 日批給劉少奇、周恩來請今即看，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。報告說：“正陽縣原報告去冬今春死一萬八千多人，現初揭發八萬多人。新蔡縣報去冬今春死三萬多人，現增近十萬人，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過去只報死六百餘人，現揭發為死四千人，佔總人口 10%，有的隊死人 80%，不僅農村，而且城市、工廠、機關、學校、商店、醫院都很嚴重。毛澤東斷言“這是階級敵人的猖狂報復，是挂着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進行階級報復，實行階級復辟，是敵奪了領導權”。然乎？

當時大躍進，深耕可以增產，便越翻越深，安徽舒城艾煊的故鄉，有深翻到大半人深、施下肥却底層土翻在上面無肥，稻、麥根系是鬚根系，吸不到底施基肥，增產造成減產，當時似未遇什麼氣候大災，則天灾乎？人禍乎？

天灾人禍定三七開，有歸之于天灾七人禍三者，實亦有歸之于天灾三人禍七者。

這次全國共死了上千萬人，是薄一波在其《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》寫在（873）頁。史諾著《彼岸》：“大躍進死了二千五百萬人。（Edpar Snow: Other Side of the River）居然有人以食鹽銷售減少量，推算減少人數更多。2005.06.16 朝网《中国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》修訂版供佈：“1959—1961 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低限值 4040 万人。（3000 万—4500 万人）”江西鄱陽縣委書記張洪福報該縣三廟前公社水稻高產畝達三十萬